

苏联的“经济改革”

苏修“经济改革”陷入绝境

梁 锋

利别尔曼的“经济改革”自从在苏联推行以来，已经满十年了。十年“改革”情况如何，本刊本期选译的几篇文章，可资鉴别。其中，苏联经济学博士勃里亚赫曼的《时间的考验》一文，既介绍了十年“改革”的过程，又供认了苏联国内一片混乱的“改革”情景，是难得的自供状，建议读者一读。

勃里亚赫曼的文章一开头就谈到，时隔十年，关于“经济改革”的评论，在苏联国内，依然是“众说纷纭，论调各异”。据他归纳，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悲观派，“变化任其多，不脱旧案臼”，认为“改革”并没有获得“大”的结果。二是乐观派，认为万事顺利，“改革”有为。作者指出，这多是一批不熟悉经济情况的书呆子观点。三是对“改革”持有异议：“是否非改革不可？”不满的情绪十分显然。至于作者本人，当然是属于“不偏不倚”的第四种观点了。虽然困难重重，却是“史无前例”，“非改不可”。摆出了一副复辟资本主义的死硬派的架势。

在苏联，为什么长时期来对“经济改革”一直是议论纷纷，这不是可以发人深思吗？在今日苏联，除了那些不着实际的“乐观派”以外，从上到下都无法否认，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企业自

治为特点的利别尔曼“改革”，已经给苏联国民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这从勃里亚赫曼的文章中就可看到：

大企业乘机获利，小企业亏损倒闭。小企业一无资金，二无权力，根本沾不到‘改革好处’的边。为了图生存，避免受大企业的排挤，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钻空子’，在品种、价格和协作上招摇撞骗”。

生产脱节，市场混乱，贿赂成风，掮客横行，到处是一片追逐暴利的无政府状态。里加灯泡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九七三年，由于灯泡管底用的薄钢片供应经常断档，工厂被迫停工。是因为薄钢片的生产缺乏原料？是因为计划中的遗漏？是因为轧钢厂任务过重？都不是。原来，毛病出在轧钢厂嫌薄钢片“油水不足”。连勃里亚赫曼也无法否认，这是苏修不得不吞食的苦果。

企业大权在握，经理神气活现，给苏修中央统治集团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而后者不得不大叫难以“集中统一”。这种叫嚷，反映了随着“改革”而来的苏修中央和地方之间、部门和企业之间勾心斗角、激烈争夺的紧张局势。

这些，都是勃里亚赫曼的文章透露出来的。实际情况当然要严重得多。但仅仅从这些透露出的情况来看，“经济改革”这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步骤，给苏联国民经济造成的混乱也够触目惊心了。经济上的混乱造成了苏修统治集团的政治混乱。各种各样的药方都开出来了：有的说，依靠电子计算机的“神力”可以加强“集中领导”；有的说，看来物质刺激不是万能的了；有的说，问题还出在现有“改革”本身。尽管各有各的药方，不过，根据作者介绍，被选中的还是进一步强化“经济改革”。这中间包括：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使企业在国家面前完全“独立自主”，即“国家对企业不负有义务，企业对国家也不负有义务”；实行联合公司制，由垄断企业干脆把各小企业并吞，强行

实施排挤工人攫取超额利润的‘谢基诺试验’、‘茨罗宾工作法’。一句话，进一步强化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这些‘改革’的补充措施 都是在最近的两三年当中实施的。结果如何呢？按照勃里亚赫曼的说法，仍是矛盾重重，阻力很大，进展不快。这种形势，确实使苏修叛徒集团寝食为之不安。

事实上，苏修的“经济改革”早已陷入绝境。国民经济的一切混乱，完全是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造成的。苏修的“经济改革”，是为了把苏联经济完全、彻底导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引起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加剧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已经而且将进一步激起苏联广大人民的抵制和反抗。这后一方面，是勃里亚赫曼之流大叫物质刺激不灵“经济改革”失效的真正原因。尽管苏修叛徒集团进一步推广“谢基诺试验”之类的敲骨吸髓的措施，但可以肯定，这不但不能克服由于“经济改革”带来的国民经济混乱，而且必然更加激起广大苏联人民的仇恨和反抗。苏修“经济改革”崩溃之日，将是苏联人民奋起之时。社会帝国主义的寿命决不会很长了。

时间的考验

〔苏〕 И. 勃里亚赫曼

自从苏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九月全会决定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在那一年出生的孩子现在都已在二年级读书。然而环绕着改革，人们依然争论不息。

三 种 观 点

象在所有的争论中一样，关于经济改革尽管众说纷纭、论调各异，但逐步逐步地终于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较多的是企业的经理以及厂里的一些工作人员。“变化任其多，不脱旧案臼”这一条法国谚语也许倒是较为确切地表达了这类人对改革结果的悲观主义的情绪。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А. 阿汉别基扬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在一次专门调查中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一千零六十四名企业经理所谈的意见。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诉说，上级机关仍然象以前一样给工厂规定了必须遵守的成本、人员定额等各项指标；根据经济改革条例，他们这些企业领导者，理应是有权自行决定的。

《真理报》上的这篇文章指出，这种侵犯企业经济核算权的事件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相当普遍的。同《国营工业企业条例》的规定相反，生产计划经常被调整，但财务指标却不作相

应的变更。这意味着吞没了经济核算制单位所挣得的利润。被征询意见的百分之九十的经理，包括几乎所有大工厂的领导人在内，至今还是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扩大各企业单位的经济权。

A·阿汉别基扬指出，近年来，“有一些部门正在逐渐地回到被党谴责过的即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方针上去”，而对经济刺激提高生产的作用却认识不足。

第二种观点，是一些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专家、新闻记者等人的观点。一般说来，这些人惯于从总体上思考问题，但对生产的情况却不熟悉。改革正在顺利地进行，企业单位已转变为完全经济核算制。现在只要善于利用这种崭新的、极为有利的经营条件就可以了。

这一乐观主义观点的拥护者们拥有令人信服的论据：几乎所有的工业和交通运输单位都转入新条件下工作（那些计划亏损的矿场、林业局、实验工厂和一些在相当恶劣的条件下经营的经济核算单位除外）。在当前第九个五年计划里，许多建筑公司和部属科研、设计机构，以及许多商业单位和服务部门正在实行向新经济体制过渡。

例如，请打开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利润总共是一千零四十多亿卢布。其中百分之四十三点四留给企业支配，用于完善技术、扩大生产及刺激工作人员。经济刺激基金几乎占了利润和其他收入中的二百一十亿卢布，比一九七三年多百分之九点三。而且，按计划刺激基金的增长速度要比生产量快二分之一。这一切难道不是证明了改革的力量和现实性吗？也许，经理们关于经济机构不够完善的牢骚怨言只不过是企图用“客观原因”来掩盖那由于自己的不善组织所带来的损失。

第三种观点：是否非改革不可？也许，扩大企业单位的职权

是得不偿失，反而招致恶果？着眼于提高自己局部利润的经济核算环节是否纳入旨在为公众、为全国造福的中央计划体系内呢？

有这样的事实：苏共二十四大就曾指出，有一些单位为了追逐轻而易举的利润，肆意抬高产品价格。他们把产品改头换面，以次充好，标以新价，而又不因提高价格而受到统计部门的注意，因为这是另一种新的产品。但从顾客看来，这种新产品并没比老产品好，可是卖价却贵了。这种情形在器皿餐具、家具甚至在设备供应上，都是经常发生的。

怎样利用这笔不属于中央投资的利润呢？工厂有了钱，就可以开始建设。建设的项日则完全是根据工厂领导的需要：仓库、房屋甚至是专供来访的检查大员们休息的芬兰式浴室。这些，当然都不是按照中央计划的要求去支配紧张的建筑材料。于是就造成了许多祸害 掮客 贿赂 最轻的也是按照“你给我、我给你”原则进行的非法交易。

上面的三种观点，都有事实为根据。

但是事实毕竟还不是全部的真理。要对改革的成就和问题作出客观的评价，只能站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不囿于几棵孤立的、即使是丰满粗壮的树木，而要把整个森林，从林间小道一直到最边缘地带，一起全盘考虑，才能得到。

改革的现实性

首先，那种关于在按新体制工作的几年中，没有什么根本性改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闭眼不看事实。也许，因为这些人成天“泡”在经济生活的中心，所以他们对于这些潜移默化逐步而来的改革，没有明显觉察到。

我们把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四年比较一下。对于工厂集体来说有些什么变化呢？变化是很多的。

第一，评价企业工作的标准不同了。在一九六五年，实际上只有一条标准，即把工作的实际结果同计划相比较，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集体奖金是根据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而颁发的。

这种情况对于战前和战后不久那几个五年计划年代是适用的。那时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来完成计划，至于企业的潜力，上面是能够盘算估量出来的。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仅仅依照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去给予评价，势必造成大家贪图任务轻，对计划机构和财政机构掩盖自己内部的潜力。而现代的大型工厂由于它那庞杂繁多的产品品种以及五花八门的复杂的技术过程，以致无论那一个检查员或视察员，如果没有工厂全体人员的帮助，都不可能发现它的潜力。“上面”尽管经常有些委员会到企业单位来检查，但是他们的大多数都是依靠“下面”厂里的经济专家们准备的东西来了解情况的。这不算是什么秘密吧？

现在对全体人员生产的评价是按三条相互有联系的标准来进行的。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特别是那些燃料、金属、化学产品和民用的高级产品，在施行奖励时是要考虑这一条的，但也只能是评价的因素之一。奖励基金的基本部分取决于企业生产比上年增长的程度和在该部门及同类企业中所处的水平。

评价企业集体工作的指标体制调整了。在一九六六年以前，类似的指标有三个：总产值、商品量以及降低成本后的节约额。现在考虑的是产品销售额、利润、赢利率（即利润对生产基金值之比）。

这样的调整是什么意思呢？在改革以前，一切衡量标准都是环绕着产品数量的。因此，尽管一件制品也卖不出去，商品生产的成绩照样可以是出色的。如列宁格勒的缝纫机工厂，在一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五年中，虽然他们的产品因质量降低削价销售仍无人问津，但由于超计划地降低成本，仍得到了大笔奖金。这些卖不出去的大衣和服装的削价所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了虚假“节约”下来的数目。可见，这种制度只是适应于战争前后那些年代的条件。那时，不管什么货物，人们都争相购买，根本不敢奢望什么超时髦的商品，不会去追求什么汽车的美观性。

现在的标准是建立在销售产品、即订户已付款的产品的基础上。没有结算帐户的进款，就完不成计划。这比无论何种训诫都更有效。虽然财务部门按传统在工厂行政机构里占据着最不引人注目的房间，但是今天在这里不仅看得到总工程师、设计家，还可看到工人社会活动家。人们千方百计地削减堆放在工厂仓库里的滞销品的数量。企业单位甚至不惜提高成本借以改进制品质量。至于改进质量所化的费用，自有顾客来付。比如列宁格勒的机床制造者们过去在降低生产费用的速度方面虽然无可炫耀，但是出口产量却增加了四倍，国家和机床联合业因此获得了额外的利润。

新体制还有一个优点。在此以前，各单位都对如何向国家取得更多的投资感兴趣，因为这有利于增加生产总额、增产商品和节约成本。而现在的赢利率指标的分母里是该企业生产基金的总值。大家都知道，分母愈大，分数值就愈小。各企业开始考虑把自己的申请同预期的利润相一致。在一九七四年苏联国民经济计划中，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八点六，利润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强，可不是偶然的。

第三个新事物——建立了平衡各单位奖励条件的机构。对于资本家来说，利润是鉴别成功的普遍尺度。滥肆开发丰富的油层 垄断新技术 向竞争对手保密 由此得到的利益 给私有者牟取了特殊的盈利。一切东西，成本越低就越有利。

对我们来说，只有跟企业工作质量相适应的利润，才是奖励该企业集体的标准。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因为企业的经营条件各不相同，而计算利润的卢布却彼此平等，对它们的来历人们是不作任何调查的。

基金收费，这是经济平等的第一个环节。企业每年必须将国家投资的机器、设备、储存和其他生产基金价值的百分之六上缴预算。投资越多，付得也越多。

借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而获得的利润也不能成为奖励的理由。拥有丰富的矿产区，廉价的原料、燃料、未经开发的采木区等条件的企业，要以地租和固定缴款的形式上缴一部分自己的利润。此外，国家对同一货物的支付的钱也有所差别。举例说，同一吨煤，一种是从顿巴斯和沃林狭窄陡削的矿层采掘来的，另一种是从库兹巴斯或是从耶基巴斯图兹丰厚的煤层里采来的，对前者付的钱就要多。

在许多机器制造部，工厂上缴给部的新技术基金是同它的产品销售额多少成比例的。而这笔基金经费的拨用取决于新技术在工厂规划中所占的比例。因此，经常带头为技术进展开闢新路的厂家，可以从那些老是跟在人家后面走路的厂家的利润中获取一份额外数目的经费。另外，由提高价格和出售旧的生产设备等方面而获得的利润也不用上缴预算。

最后，第四点……即使是悲观主义的经济学家，也不能否认在改革过程中建立的经济刺激基金的意义。在许多先进的企业里，每五个卢布的劳动报酬内就有一个卢布是由基本工资之外支付的，也即由改革所建立的奖励基金支付。企业的利润成为组成工人们收入的重要来源。

新的计划体制和经济刺激体制有助于克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某些不良倾向。资金周转的加快，促进了利润的增长，也使基

金效率，即每卢布生产基金的销售额不再降低。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指出：“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党在实行经济改革时，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对完善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作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同时还有许多问题远未解决。”

经济核算制过时了吗？

在整个一九七三年，里加灯泡厂由于作灯泡泡头用的钢带供应不正常，生产一直时断时续。申请书按时打了上去，基金也拨下来了，计划任务在负责供应的工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定径厂也得到了核准……但是钢带还是没有。写信到自己的部和冶金部去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倒是几家兄弟单位颇表同情，贷给了少量钢带。

事情出乎意料地解决了：关于这家工厂的苦恼反映到了《真理报》。一星期之后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运来了八十多吨钢带。里加厂总算完成了计划。但是这个完成是花了怎样的代价啊！工厂经理和他的助手们的绝大部分时间不是用于关心完善生产，而是去寻觅材料。请问，由于生产组织的不完善致使成千个小时都“付诸东流”之后，要说服工人们珍惜每一分钟难道容易的吗？

《真理报》的工作人员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象通常一样，在开始时，负责供应的工厂推说任务过重，而部里，则借口计划中遗漏掉了。但是，最后还是搞清了：既不是任务过重，也不是计划的差错，其实是因为生产这种薄钢片无利可图罢了。一心想自己获利，供应者拣中了“油水足的”——拼命生产大规格的厚钢带。有利可图的订货永远是轧进“截止期”的。而没有“报告”的工作那就得“从缓”放在季度末或是年终。到那时再要完成

订货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毛病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是原料资源缺乏吗？一九七四年的计划已经对保证国民经济的燃料、金属和化学制品的供应预先采取了措施。同时，还应看到苏联在采掘煤、铁、石棉、锰和其他一些矿藏方面 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而焦炭、水泥、石棉混凝土板、钢筋混凝土以及钢铁、木材的产量，也是举世无双的。

是经营者和计划者的觉悟和纪律性差吗？苏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全会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消除违反计划纪律的现象（包括破坏物资技术供应，财务计划同建筑材料、设备、燃料、原料、配套零件、金属供应的脱节 等等）也就是要抛弃所有那些因不负责任、低水平的领导、肆意挥霍人民钱财而造成的不良现象。

在一般的经济情况中，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并不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形式，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定径厂中断对里加厂薄钢带的供应决不仅仅是出于对奖金的喜爱。提前完成计划吨数，也就意味着得到上级对企业成就的嘉奖和赞许，意味着该企业领导者威信的提高。

但是，难道不能用电子计算机的调节力量去替代可恶的物质刺激吗？ACY（自动管理体系）这个新名词进入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几年。在一九七四年，自动管理体系还只有六百五十台，它们负责管理技术进程，管理企业，自动整理全部的情报。自动管理体系的能量很大，它们能记下在所管的对象的成百项指标中的变异，即刻加工和记下所得到的资料，从成千种可行的活动方案中选出最佳方案来。但是，自动管理体系这种神奇的力量能否取代经济核算制，从而给每一个工人指出通向目标的捷径呢？

有些自动管理体系的设计家完全忽视他们活动中的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照他们的意见，改革管理的问题仅同加强电子计算机的能量有关，建立统一的计算中心网和加强它们的数据可靠性有关。至于经济核算制，照他们的意见，仅仅是在理想计划纪元到来之前的权宜之计。可是今天的一切，并不只是加加减减，套套公式，或是用电子计算机便可包罗一切的。否则，这岂非成了个万能的萨满教者了吗？

即使是站在数理经济学的立场上来看，这种经济核算制过时论也是不经一驳的。按照经济控制论的奠基者之一诺沃日罗夫的计算，苏联国民经济分配资料的可能方案的总数达 10^{500} 。十的五百次方，这是一个天文巨数，比至今为止科学可知的最大的具体数目——可见世界的原子数还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怎样的电子计算机思考体系都不可能在一个可能接受的期限内计算如此繁多的方案。因此，关于中央统一领导各企业所有的业务活动等想法只是幻想，至少在目前一代的时期里，它是实现不了的。

在国民经济的所有环节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这是苏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九月全会规定的极其重要的改革方向。完全经济核算制是国家同企业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它是建立在经营单位的经济自主、收支完全相抵、物质上的利益和责任这样一些基础上。在通向这样的经济核算制的道路上，我们暂时还只是迈出了最初的一步。

在完全经济核算制条件下的经济独立，意味着企业资金在经济周转中的实际独立。这种独立原则是在列宁的一份法令中指出过、并且载入现行的章程中去的：“国家对企业不负有义务，企业对国家也不负有义务。”

这条原则丝毫不会危及较为重要的中央计划任务，也不意

味着经营单位的完全独立自主。那样的自主，象实际表明的，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某些个别的企业集体对工厂私自占有的合法化，而这是列宁绝对反对的。

在改革前的有限的经济核算制时期，经营管理的独立性是由自负盈亏、独立的财会制度、银行结算帐户、法人权等来保证的。对于经济上的这些独立性，现在已显得不够了。还需要一套经济标准，这些标准给企业同社会间的支付和交换确立一种长期的、明确不移的依赖关系。这些标准应在“业务法规”中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对在同一条件下经营的企业集体来说，理应是唯一的标准。当企业了解到所有的利润、除了偿付社会提供的原料费用之外，全将留归其支配时，它就会努力完成紧张的计划，并力争向国家要得少些，向社会给得多些。

收支相抵……在有限的经济核算制时期，它仅仅跟日常的原料消耗、工资报酬等有关。以贝加尔纸浆造纸联合厂为例。该厂的销售进款大大高于其开支。照现在的标准，因它的高赢利率是可以受到表扬和奖励的。但是，除了日常开支以外，还有预先垫付的、一次性的开支如用在基本建设、科研、干部培训、勘探、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再生产，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它们在生产的总开支中成了主要项目。如果考虑到这些开支还是由国家预算予以负担的，那末，对贝加尔纸浆造纸联合厂的贡献的评价就当另作别论了。

收支全部相抵，这就意味着企业用自己的收入偿付所有的生产费用：投资以长期贷款的形式得到，并要保证归还；为所用项目支付科研机关研究费用，偿付培训专家的支出，偿付使用农业土地的有关费用；保持水源清洁的费用；偿付所有被利用的自然资源。

实行那样一系列的付款后，当原有的专家不顶用时，企业也

不会申请新专家了，因为它觉得不合算；它将在工地上寻找荒地，而不去向执委会要求征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土地；人们对于采用新技术有何好处将会另有看法。

而最为主要的，由于实现了完全的收支相抵，最终将出现一条可靠的统一标准来评价企业集体的工作。它还将使物质上的利害关系能建立在企业集体自己创造的收入来源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上面拨下来的、严格限制的工资基金的基础上。这样一来，工资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工资了。

物质责任至今仍然是公认的经济核算原则。但是，目前的罚款、违约金的计算取决于违约产品的价值，因此，里加灯泡厂对自己的供应者所能提出的那份起诉，也许还不能抵偿损失的百分之一。完全经济核算制要求：造成了损失，就得用自己的利润和奖励基金去赔偿。

改革的基本环节

经济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为适应科技革命的要求调整领导经济的方法的相当长期的过程。这样的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有幸首先把它的成就跟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在这条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要有探求和牺牲，有所发现和试验。回顾在它的幼年所写的许多文章，今天显得多么幼稚可笑啊！

那种相信几项决议便能改变几十年来形成的经营体制的想法是何等天真！

体制这个东西，首先是关系到把它付诸实施的人们。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和风格，发扬普遍的创造性、经济上的首创精神，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而进行普及的经济教育、建立领导于部

的培训网，用对待竞赛的态度去替代工作人员之间、各企业集体之间的劳动竞争，则是这条新路上的路标。但是，直至现在，习惯势力、未能灵活运转的经济机构，正如苏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全会所指出的，还在妨碍我们去解决新的任务。

很多经济学家在谈及改革时，只是着眼于评价奖励指标的调整。某一个“神奇的标准”，如定额加工价值，赢利率或“每人基金产量”同扩大经理的权力和不加限制的奖励相结合，经常被看作给一切工厂解苦救难的灵丹妙药。

然而一切远非如此简单。

无论是谁也没有找到一个万能的评价指标，而如果当企业集体不善于或不能够对生产实现改造时，那么奖金刺激也就无能为力了。今天大家都已明白：改革决不单单是一个刺激的问题。这是一套统一、完整的、能改善所有的经济机构的方法体系。

企业是基本的环节。正是在这里生产物质财富并体现新办法的效果。但是目前的经济基层组织是什么样的呢？五万家工厂、矿井、矿场中，有三万家不超过二百个工人，这里没有任何的科技组织。五万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收获季节里感到干部极端缺乏，而在冬天却又不知道让工作人员干些什么。五千五百个科研所和同样多的设计院、三万个建筑机构、一万二千五百多个试验基地，四千多个安装公司……科研所把总结和专题学术报告束之高阁，设计师、建筑师和试验基地，也把它们的图纸和试验样品束之高阁，他们中无人对科技问题的决定自始至终地承担责任。

经济基层组织的分散性是改革所遇到的根本障碍。正是因为这些小厂小业不会内行地支配自己的新权力，从而给改革的设想投下了阴影。

既然是奉行同一个条例，那么所有的经理表面上得到的可能性应该跟，譬如说，基辅厂的领导人是一样的。但仅只是表面而已，而不是实质上。有三万家企业没有自己的设计师、工艺师，甚至没有实行新技术的计划。大的科研机关和建筑组织认为不去同那些既无真正的资金又无全国性威望的订货者联系是理所当然的。结果，这些小经济企业为了获得奖金常常只有一条路可走：利用自己的权力钻我们计划机构的空子，在品种、价格和协作上招摇撞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只是没有载于报章杂志上罢了。

我国工业在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将进行原则性的调整。四十五年来，是第一次对企业的本质实行改变，而不是改变隶属关系和领导的名称。现在起作用的已不是早先的生产基层组织——工厂等，而是生产或科学生产的联合公司——统一的经济综合体。

现在谈的是组织起来的新型的基层组织，它含有工艺技术锁链中的好几个环节。确定联合公司组成的是经济上的合理性，而不是部门和地区的配置。例如：“斯威脱拉内”公司的专业是多向电子仪器，其中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同生产车间结成统一的整体，强有力的设计机构。在托尔柯维契村有一家自己的玻璃工厂，它保证玻璃的供应。强有力的设计局为生产电子产品详细研究了自动装置，它们就在自己的装配车间里生产。

试分析一个与普通工厂经理有关的情报。从根本上来说，这只是些外部的情报，它们跟无数的供应者、加工者有关。实质上这些事情从外部决定了企业集体工作的效率。在联合公司中，许多这样的外部联系成了内部的、由公司领导监督的联系。对于这样一个能对事业负责，而不将责任推诿于败事的“隔壁大叔”的经济单位，自动管理系统才能成为现实，因为电子计算机

能够管理的仅仅是独立自主的，时时刻刻都不会因外界的原因而中断自己的活动的综合体。

联合公司其实是科技基层组织的一种新形式。迄今为止，这个组织是对“研究——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负责：科学研究所负责按期交付科学报告并作相应的推荐；设计局负责制作新机器的图纸，实验工厂负责生产样品。在一段时期内，这样的安排曾经是唯一可行的，因为从科学设想到投产需要十五年至二十年。无论哪个工厂都受不了在自己的单位里设有这样一个需要等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出成果的科研车间。这个车间势必被中断科研，而转向生产现行产品。

今天，正象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在合理的组织下，科研生产的周期只需花三至五年。把科研同生产结合起来，今天已成了必行之势了。

在一九七三年，苏联有百分之九十四的科学工作者脱离生产实际在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工作。而在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在科研生产的综合单位工作，他们的产品不是报告 不是图纸 而是新的技术、操作工艺 新的生产组织和新的产品。

也许许多设计机构的命运也将改变一下。这种组织创建于三十年代，当时需要安装从国外买来的设备。他们同本国科学没有实际接触过。今天，在整个对外贸易中，十分之九的设备是按苏联学者的设计制作的。因此，设计家们的位置应该在联合公司，那里有强大的科学基地和专门的建筑安装管理。

联合公司是新型的经济核算基层组织。只有经济独立、完全收支相抵和其他一些完全经济核算的特征才是可以思议和可行的。只有在大型综合体的范围内才能确定全部费用和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这两者的比较即是经济核算的基础。只有这样的